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18

#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罗荷花,刘津辰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和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均产生正向影响,但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对金融能力提升的间接效应大于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原因在于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普惠金融机构和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关键词:**金融能力;农村贫困人口;普惠金融;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136-07

金融能力是指居民运用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金融意识去利用外部环境而做出有效金融决策行为,以实现各种福祉应具有的能力。我国农村人口金融能力较低,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更低<sup>①②</sup>。我国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完成以后,农村贫困治理的重心要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要从贫困人口脱贫转向农民贫困风险治理<sup>③</sup>。农民贫困风险治理需要增强农民的金融能力,但是目前农村贫困人口较低的金融能力,不仅制约其内生成长和脱贫致富,也使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农村推广。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金融能力提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把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居民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而且,目前大多数关于居民金融能力研究聚焦于金融素养,与金融能力还是有较大差别。另外,农村贫困人口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性,使影响金融能力提升的因素也有着特殊性。因此,本文在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大力发展背景下,构建了由农村贫

困人口自身因素、普惠金融机构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组成的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此可持续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

## 一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一) 研究假设

本文从农村贫困人口自身、普惠金融机构、政府及其他部门等方面探讨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路径包括: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其提升金融能力有直接影响、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和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对其提升金融能力有间接影响。政府及其他部门与普惠金融机构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见图1)。

1.假设一(H<sub>1</sub>):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其金融能力有直接影响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是提升其金融能力的

收稿日期:2020-07-0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8YBQ066)

作者简介:罗荷花(1986—),女,湖南衡东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

①张欢欢,熊学萍:《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决策的影响路径与实证检验——基于山东省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②罗荷花,谢晋元:《深度贫困地区农村人口金融能力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3期。

③夏支平:《后脱贫时代农民贫困风险对乡村振兴的挑战》,《江淮论坛》2020年第1期。

决定性的内在因素。无论是政府部门制定金融能力提升扶持政策,还是普惠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知识和金融指导,如果农村贫困人口没有发挥自我能动性,这些有利的外界因素也很难提升其金融能力。农村贫困人口拥有提升金融能力的意识、提高学习金融知识和技能的主动性、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均利于提升其金融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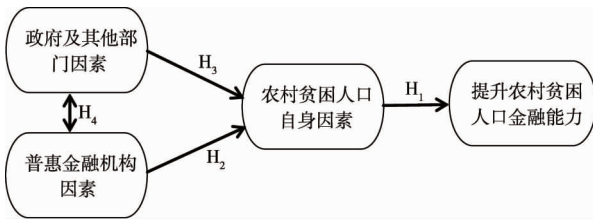


图 1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1)农村贫困人口自我意识到提升金融能力的重要性,会促使提升其金融能力,并在大脑中不断强化该意识。根据弗洛伊德的意识层次理论,农村贫困人口提升金融能力意识会逐渐形成自我的前意识和无意识,进而对人的金融行为产生影响。随着农村贫困人口提升金融能力意识不断增强,其对金融教育重视程度越高,越能积极接受金融教育,并不断丰富金融知识和技能,积极优化其金融活动。

(2)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学习金融知识和技能的主动性越高,越能够提高自我学习动机,甚至在不依靠外界推力下也会主动学习。这种主动性来源于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并驱使其不断提升其金融能力,实现个体自我发展。同时,农村贫困人口还会积极参与到普惠金融机构、政府及其他部门开展的金融知识宣传、金融教育和指导等活动,并提高其金融知识和技能的可得性。

(3)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较高,越有利于破解金融排斥难题,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同时,农村贫困人口在参与金融活动中能够不断纠正金融知识或技能的认知错误、调整金融行为偏移等,农村贫困人口在自主摸索和实践中提高金融知识、技能及意识水平,并优化金融行为,进而促使其金融能力提升。

2.假设二( $H_2$ ):普惠金融机构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对其提升金融能力有间接影响

普惠金融机构因素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提升金融能力的外在因素。普惠金融机构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

传、开展金融教育和指导等,通过农村贫困人口对其提升金融能力产生间接影响。

(1)普惠金融机构重视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工作,以持续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为目标而制定实施方案。普惠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开展金融教育和指导等方案,为农村贫困人口提升金融能力创造有利环境,并让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干中学”方式来参与各实施方案,提升其金融能力。

(2)普惠金融机构针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需求特征开发与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提高其可得性。普惠金融机构践行普惠理念,让农村贫困人口意识到获取金融服务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从而能够积极参与金融活动,并自主选择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机构避免因不合适或不负责的金融服务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利益损害,提高参与金融活动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进而有效提升其金融能力。

(3)普惠金融机构积极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可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获取金融知识储备水平,不断强化其提升金融能力的自我意识,进而影响金融决策。普惠金融机构可以在营业大厅或手机终端及时公布最新金融产品、在农村集市或居委会发放金融知识宣传单、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等,让农村贫困人口参加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并获得所需的金融知识和技能。

(4)普惠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金融教育和指导,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准确理解与辨别金融产品,获取更多金融知识和技能,并做出科学金融决策。随着目前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化,农村贫困人口面临金融风险和金融欺诈的可能性增加,使得农村贫困人口更需要普惠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教育和指导。普惠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教育和指导,还可以防止农村贫困人口因对现代消费金融产品的好奇与无知,出现盲目追逐消费金融产品形成的过度负债、盲目自信等现象,实现其金融能力内在提升。

3.假设三( $H_3$ ):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对其提升金融能力有间接影响

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是影响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外在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加大制定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的扶持政策,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教育指导、加快建设农村金融基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法律规章制度等,通过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对其提升金融能力产生间接影响。

(1)政府及其他部门加大制定金融能力提升的扶持政策,为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供保障<sup>①</sup>。政府及其他部门提供财政资金支持,或设计激励相容机制,通过税收优惠、差异化监管等政策引导普惠金融机构重视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工作。政府扶持政策还可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合理运用金融产品及服务,提高其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

(2)政府及其他部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教育指导活动,有利于扩展农村贫困人口获取金融知识和教育指导的渠道,丰富金融知识和技能储备,为金融能力的提升提供知识支持保障。如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开展定期与非定期、集中与非集中的多种形式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教育机构将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由此形成一个金融知识和教育指导的长效机制。政府及其他部门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教育指导活动,还可以让农村贫困人口解决在现实金融活动中所遇问题,增强其金融意识,并提升其金融能力。

(3)政府及其他部门加快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为提升金融能力提供硬件支撑保障。加强农村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将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系统与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信息实现信息对接,不断完善信用信息系统,可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更低成本获得金融服务。同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贫困人口“数字鸿沟”问题,可以更积极参与金融活动。

(4)政府及其他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为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供法律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缺乏农村金融法、居民金融能力提升法律条款等,难以从法律层面保障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金融知识和教育等。为此,政府及其他部门制定居民金融能力提升的规章条例或法律条款,促使农村贫困人口能够获得所需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接受金融教育与培训,实现其金融能力提升。

4.假设四(H<sub>4</sub>):政府及其他部门与普惠金融机构发展相互影响

政府及其他部门的政策与举措会影响着普惠金融机构发展,而普惠金融机构发展会反作用影响政府及其他部门的政策与措施,由此两者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

(1)政府及其他部门的政策与举措影响普惠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拓展金融服务等,进而影响机构可持续发展。一是政府及其他部门制定定向降准、优惠利率等扶持普惠金融机构发展各项政策,鼓励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并通过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对因提供普惠金融服务造成损失的普惠金融机构给予风险补偿,利于机构可持续发展。二是政府及其他部门利用政策和举措来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增设物理网点、数字设备等方式在偏远地区攻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ATM、POS机等金融设施不断推广使用,手机银行、网上支付等金融工具应用覆盖面扩大,促使金融服务触达到农村贫困人口手中<sup>②</sup>,其金融服务边界不断拓展,进而促使机构不断发展。三是政府及其他部门完善普惠金融机构法律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等,为普惠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等提供法律保障,并提高机构金融服务供给能力。

(2)普惠金融机构发展反作用影响政府及其他部门的政策与措施。普惠金融机构提升金融能力的成功做法及难题,均会利于政府及时调整政府政策及制度措施。如针对目前普惠金融机构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工作不够重视,政府及其他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构建激励机制等方式促使普惠金融机构重视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工作。

## (二)模型选取

结构方程模型是建立在已有因果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潜在变量、显性变量等之间的关系,并用路径图、因果模式等形式来表达变量之间关系,可以有效解决潜在变量无法直接测度、变量之间关系等问题。由于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普惠金融机构因素等衡量指标在现实情况中存在着难

<sup>①</sup>程郁:《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回流的政策性机制研究》,《经济纵横》2019年第11期。

<sup>②</sup>贝多广,莫秀根:《攻坚“最后一公里”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8》,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以直接测度或衡量问题。因此,基于上述研究假设,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 二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8~12 月课题组运用随机抽样法在湖南省邵阳县和炎陵县、湖北的郧西和郧县选取农村贫困人口、普惠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政府及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教育及研究机构工作人员四个群体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各群体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的衡量指标态度判断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因素对提升金融能力的影响。调查共发放 1 200 份问卷,其中每个群体各发放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总数 1 187 份。其中,农村贫困人口、普惠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政府及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教育及研究机构工作人员分别回收 295 份、296 份、297 份、299 份,分别占有有效问卷总数的 24.85%、24.94%、25.02% 和 25.19%。

数据显示,调查样本的年龄在 30 岁以下有

92 人,30~45 岁有 487 人,45~60 岁有 506 人,60 岁及以上有 102 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7.75%、41.03%、42.63% 和 8.59%。调查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 293 人,占样本总数的 24.68%,且这些样本数均是来自于农村贫困人口群体,说明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调查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或技校 264 人,占比为 22.24%;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或大专 341 人,占比为 28.73%;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 289 人,占比为 24.35%。调查样本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 万以下有 302 人,1~3 万有 362 人,3~6 万有 320 人,6 万以上有 203 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25.44%、30.50%、26.96% 和 17.10%。

表 1 为本文构建的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及问卷收集具体指标情况。在研究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的实际情况后,构建以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普惠金融机构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以及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等潜在变量,及由 15 个题项来测度潜在变量。每个指标答案选项有 7 个,并根据选项进行相应赋值。

表 1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及其量表情况

潜在变量	编号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	RP1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提升金融能力的自我意识较高	5.242	1.392
	RP2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学习金融知识和技能的主动性较高	5.217	1.405
	RP3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较高	5.052	1.512
普惠金融机构因素	FI1	普惠金融机构较为重视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工作	5.232	1.435
	FI2	普惠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适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5.243	1.407
	FI3	普惠金融机构积极加强金融知识宣传	5.244	1.434
	FI4	普惠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金融教育和指导	5.336	1.388
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	GD1	政府及其他部门加大制定金融能力提升的扶持政策	4.840	1.504
	GD2	政府及其他部门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教育指导	5.332	1.409
	GD3	政府及其他部门加快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	5.226	1.416
	GD4	政府及其他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5.198	1.523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效果	FC1	农村贫困人口金融知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5.196	1.433
	FC2	农村贫困人口金融技能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5.144	1.433
	FC3	农村贫困人口金融意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5.063	1.481
	FC4	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行为得到明显优化	4.858	1.567

### (二) 信度和效度检验

运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如果 Cronbach's  $\alpha$  系数只要大于 0.8,说明信度就是非常好的。由于样本数据总体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69,说明总体信度是非常好的。另外,运用 KMO 检验及 Bartlett 球形检验进行效度检验。由于样本数据总体 KMO 指数为 0.973,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达到 18 183.07,说明总体效度

非常好的。各个构面和总体数据都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sup>①</sup>。

### (三) 模型参数估计、适配度检验及估计结果

#### 1. 模型参数估计值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通过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归系数两种方法来衡量结构方程模型的非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和标准化参数估计值(见表2)。

#### 2. 适配度检验

通过绝对适配度指标和增值适配度指标来检验模型的适配度。 $\chi^2$  值显著性概率值小于 0.05 时,说明模型适配度好。RMSEA 值小于 0.05,说明模型适配度理想。GFI 值、AGFI 值、IFI 值、TLI 值、NFI 值、CFI 值的临界值为大于 0.9,说明模型适配度理想。根据这些适配度指标判别原则,从表 3 可知,整个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适配度很好。

表 2 构面中各种参数的估计结果

构面	指标	模型参数估计值				
		非标准化参数估计值	标准误 S.E.	临界比 C.R	显著性 P 值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
普惠金融机构因素	FI1	1.019	0.060	16.586	0.000***	0.837
	FI2	0.981	0.063	15.971	0.000***	0.822
	FI3	1.025	0.060	17.379	0.000***	0.843
	FI4	1.000				0.850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	RP1	0.929	0.018	50.294	0.000***	0.910
	RP2	0.916	0.019	47.384	0.000***	0.889
	RP3	1.000				0.902
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	GD1	1.000				0.832
	GD2	1.000	0.026	38.565	0.000***	0.888
	GD3	0.947	0.027	35.048	0.000***	0.837
	GD4	1.038	0.029	36.126	0.000***	0.853
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	FC1	1.000				0.900
	FC2	0.992	0.021	47.789	0.000***	0.893
	FC3	1.034	0.021	48.915	0.000***	0.901
	FC4	1.065	0.023	45.696	0.000***	0.877

注:AMOS 导出结果中“\*\*\*”表示显著性概率值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1$ 。

表 3 模型适配度指标判断

指标	绝对适配度指标				增值适配度指标			
	$\chi^2$ 值	RMSEA 值	GFI 值	AGFI 值	IFI 值	TLI 值	NFI 值	CFI 值
实际拟合值	0.000	0.052	0.959	0.943	0.985	0.982	0.980	0.985
判定参考值	$p < 0.050$	$< 0.080$	$> 0.9$	$> 0.9$	$> 0.9$	$> 0.9$	$> 0.9$	$> 0.9$
适配判断	理想	适配合理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注: $\chi^2$  值的实际拟合值显示为  $\chi^2$  值的显著性概率  $p$  值。

#### 3. 模型估计结果与中介效应分析

依照上述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路径,运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得到非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以及各路径系数(见表 4 及图 2)。

在各路经系数均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对模型

各路径开展中介效应分析,估计结果为:(1)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路径系数为 0.969,且  $P$  值在 1% 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一得以验证。(2)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农村贫困

<sup>①</sup>篇幅所限,分析结果不予呈列。如读者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417 及 0.969, P 值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且间接效应系数为 0.404,说明普惠金融机构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产生显著正向的间接影响,假设二得以验证。(3)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515 及 0.969,且 P 值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且间

接效应系数为 0.499,说明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产生显著正向的间接影响,假设三得以验证。(4)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与普惠金融机构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系数为 0.848, P 值在 1% 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和普惠金融机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四得以验证。

表 4 SEM 模型路径系数估计结果及显著性检验

路径内容	模型参数估计值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	标准误 S.E.	C.R	p	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
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	0.917	0.020	45.428	0.000 ***	0.969
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	0.562	0.043	13.150	0.000 ***	0.515
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	0.482	0.045	10.784	0.000 ***	0.417
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普惠金融机构因素	1.249	0.067	18.707	0.000 ***	0.848

注:AMOS 导出结果中“\*\*\*”表示显著性概率值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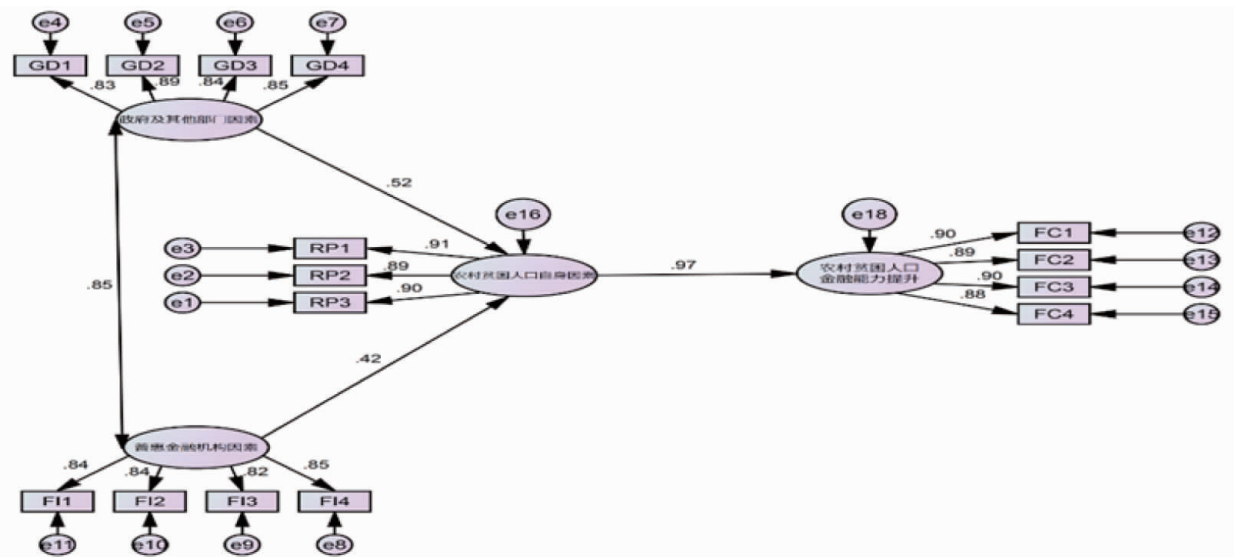


图 2 结构方程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

(四) 模型检验结论

依据上述模型估计结果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和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最大,说明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农村贫困人口自身通过自主学习金融知识

和技能、自我积极参与金融活动积极性等方式不断提升其金融能力。(3)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产生间接正向影响。说明政府及其他部门通过政府政策扶持、金融知识宣传和教育指导等,作为外在因素间接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4)普惠金融机构因素通过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产生间接正向影响。说明普惠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宣传金融知识等方式,作为外在因素间接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5)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直接效应均大于普惠金融机构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间接效应。并且,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间接效应要大于普惠金融机构因素的间接效应。这说明相比普惠金融机构因素而言,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更大。

为什么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比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的影响更大呢?可能原因在于:当前政府主导开展的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是遵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并没有真正改革所有传统的金融体制或制度,导致普惠金融机构还是参照或沿用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针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需求而开发与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较少,致使各普惠金融机构陷入金融服务同质化困局<sup>①</sup>。同时,由于农村贫困人口、普惠金融机构等微观经济主体缺乏积极参与,导致这些微观经济主体在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方面还未充分发挥作用。如普惠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目标客户漂移现象,导致农村贫困人口难以以合理成本去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难以参与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等,说明普惠金融机构提升金融能力工作还有待加强。

### 三 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农村贫困人口、普惠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等1187人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影响因素的衡量指标的态度判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普惠金融机构因素等构建了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和普惠金融机构因素对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均产生显著正向因素。(2)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的间接效应大于普惠金融机构因素。

所以,为可持续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需要合理处理与协调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普惠金融机构因素、政府及其他部门因素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注意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机构在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农村贫困人口要激发提升金融能力的内在动因,加强学习金融知识和技能,增强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提升自身的金融能力。

##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mproving Financial Capabilities of Rural Poor Population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LUO He-hua & LIU Jin-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 that the factors of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mselves, inclus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and other sector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capability of rural poor population, bu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government and other sector's facto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reform under th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is sti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vernment's stop-down mandatory financial system change, and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poor people has not been fully played.

**Key words:** financial capability; rural poor population; inclusive fin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责任校对 王小飞)

<sup>①</sup>王汉杰,温涛,韩佳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1期。